

新文化运动历史记忆的省思

——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中心

李净昉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反传统的激进言行并存的历史图景是官立新式女子学校为女性接触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多种方式和可能。对传统经典的阐释也不再是男性知识精英的特权,而是通过两性的共同解读和传播,具有更加丰富的性别意涵。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语境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阐释往往与国族主义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出于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愿望和对社会失序的极度焦虑,他们不断阐发传统经典的时代意义。近代报刊媒体积极参与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历史记忆的形成与传播,为传统文化在近代的阐释与传承提供了十分便捷、开放的舆论平台,更凸显了女性有关传统文化的言说的社会意义与现实价值。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 传统文化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女子教育 性别

【作者简介】李净昉(1981—),女,甘肃兰州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近代报刊媒体与女学研究——以天津为中心”(2012M520568)

【收稿日期】2013-12-20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4)01-0060-07

1915年,由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新文化运动留下了“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等文化遗产。其中,“民主”和“科学”已然凝结成为人们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共同记忆。然而,有学者通过对这一时期出版发行的《新青年》等报刊媒体资料的系统整理和统计分析,发现“民主”的出现频率不及“科学”,且时人对其意义的理解和使用方式也与后世的言说有很大的出入。^①可见,特定时代的语汇和思想在传播、进而融入历史记忆的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么,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被人们一致认定是传播新知识、新观念的新式学校究竟是如何理解传统文化、怎样阐释传统文化的,也很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一、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式女学

晚清以降,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式女子学校。在各级各类女学中,官立女子学校尤其引人注目,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目前有关女子教育的研究成果着重阐释了新式官立女学在培养新国民、推动女子接受教育和立足社会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②还有学者以不同地域的新式女子学校为中心,重点分析了“新女性”的成长过程。例如,何玲华通过对北京女高师的研究,探讨了五四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与新一代知识女性的成长;^③万琼华将周南女校置于近代民族主义与女权运动盛行的

①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270页,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② 丛小平《从母亲到国民教师——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公立女子师范教育》,载《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③ 何玲华《新教育·新女性:北京女高师研究(1919-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宏观背景下,通过个案研究解读女子教育思潮与民族国家建构、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之间的内在关系。^①这些研究阐明了新式女子学校在传播新知识、塑造新女性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近年来,以性别研究为路径,考察近代女学的论著则逐渐关注女子教育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②已有的成果对于深化近代新式女子教育制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是却较少考虑和回答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新式女子学校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多重复杂关系等问题,更未能对历史记忆形成与传播等议题进行深入分析。

本文拟以新文化运动时期活跃一时的新式学校——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中心,从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师生的书写及其思想表达等方面入手,评析在教师、学生的共同参与下,传统文化在新式学校中的诠释与传播,揭示其文化意涵和时代特色,丰富人们对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关传统与现代等历史记忆形成与传播的思考。

清末新政时期,直隶特别是天津的新式女学发展迅速,变化较多。其中,1906年在天津成立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③就为各界所瞩目。其对清廷制定女子教育制度和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等新式女学的建立,都产生了较大影响。^④本文所关注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即由这所学堂发展、演变而来。在《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颁布之前,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已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下,由直隶提学使傅增湘^⑤等人筹备并建立。其学堂章程明确指出“本学堂为造师资,尤重妇德,一切管束教授务在陶冶其行为心性,使可为后生仪范,一切急进过新之学说时论概戒弗谈。”^⑥由此不难发现校方对于传统礼仪、规范及其性别秩序的重视和维护。

在中国古代,集中体现儒家思想的《女诫》、《内训》等著作长期被奉为教导女性、建构社会性别关系的经典。近代以来,尽管西学已经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社会,但是官方依然认定传统经典所倡导的道德观念和性别规范需要继续提倡和弘扬。因此,女四书等女教经典的部分内容也被纳入新式女子学校的教材之中,以期成为塑造理想的“国民之母”的要件。

1907年颁布的《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明确提出“中国女德,历代崇重。凡为女、为妇、为母之道,征诸经典史册,先儒著述,历历可据。今教女子师范生,首宜注重于此,务时勉以贞静、顺良、

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与懿嫩之风俗。”^⑦该章程甚至还规定,凡是在女子师范学堂用来教授修身科的课本,务必根据经训,并荟萃历代的女学经典,如汉代的《列女传》、《女诫》、《女训》,唐代的《女孝经》,宋代的《家范》,明代的《内训》、《闺范》、《温氏母训》,清代的《女教经传通纂》、《教女遗规》、《女学》、《妇学》等书。对于外国女子教育所使用的修身教材,则必须采撷其中与中国相符的内容,融会编成。可以看出,官方强调在尊重和继承中国传统性别文化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女子教育的成果。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新式女子学校的围墙并未隔断革命思潮的传播,也无法阻拦一部分师生投身革命活动。例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地理教师白雅雨和一些女学生就积极组织和参与了京津的革命行动,但校方仍然坚持对传统性别观念与文化的保存和延续。傅增湘一再劝诫即将毕业的女学生们,在具备求生心、公德心、忍耐心的同时,“仍归重于保守中国旧有女德,勿为今日异说所惑”^⑧。对于校方的反复劝诫,女学生中倾向革命者不予理会,但那些认同传统者则谨记在心,在日常生活中加以

- ① 万琼华《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以周南女校(1905-1938)为中心的考察》,第3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 ② 例如,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杨剑利《清末民初女学实践状况考察》,载《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
- ③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教育部规定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北洋女子师范学堂遂改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校。1913年,天津成为直隶省省会,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更名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1916年,由于各地陆续兴办女子师范学校,该校名称改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 ④ 何玲华《新教育·新女性:北京女高师研究(1919-1924)》,第14页。
- ⑤ 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晚年号藏园老人,生于四川江安,后移居天津。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贵州提学使、直隶道员、直隶提学使。创办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任监督。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贡献良多。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近代人物录》,第352页,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1987年版。
- ⑥ 《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见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下册),第1117页,传记文学社1975年版。
- ⑦ 《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812-81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 ⑧ 《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毕业纪盛》,见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下册),第1166页。

践行,并通过口语和文字进行传播,参与历史的书写。

民国初期,由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发展而来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仍把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研习内容。在学校开设的课程中,国文、修身等科是教授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科目。教师和学生透过语言文字的揣摩、思想内涵的解读及审美价值的欣赏等方式,从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领悟、挖掘并传播传统文化的精髓。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们继续履行“传道、授业、解惑”等传统职责,扮演启蒙者的角色。他们通过带领学生朗读传统经典、为学生解释生字难句的意义、分析文章主旨和各段要领、探讨文体和文法使用等环节,启发学生对传统经典的理解。教师通过安排学生练习命题作文,既使她们进一步巩固了课堂上学习和掌握的知识,又为她们提供了驾御文字、锻炼思辨能力以及展现文采的机会。

除了正式的课程教授,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还定期邀请社会各界名人来校发表演讲,从而为女学生了解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社会文化开辟了新的途径。透过1916年至1918年来该校的演讲者及其主题,可见一斑。例如陶孟和发表了《女子地位之变迁》的专题演讲,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自由、平等、博爱》,陈修夫就《欧战之经过与吾国之将来》这一议题发表宏论,邓澄波则专谈《村民教育》,张伯苓讲解了《满洲朝鲜之现状》,齐国梁分析了《江浙教育之状况》等。就演讲者而言,不仅包括拥护和主张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也有对传统文化不无好感者。其中包括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教师以及大力推动社会改良的教育界、宗教界的重要人物。他们纷纷借助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提供的话语空间,发表论说,既有助于女学生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也阐明了各自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有关社会改革的主张,进而确立了自身作为教育者、改革者的社会身份。同时,他们各自的教育背景和生活阅历又加深了女学生对不同国家、地域以及城乡之间文化差异性的认识,拓宽了她们的文化视野。

值得关注的是,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教师和学生还借助《直隶第一女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来阐述各自的主张,形成文化观念的碰撞,促进思想的交流和升华。尽管教师们参与了稿件的审阅、修改,但女学生们在《直隶第一女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都发挥了一定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透过这一公共平台,师生们围绕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展开了内涵丰富的对话。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也通过报刊媒体以及各自的社会网络向学校之外的广阔空间进行了传播。

二、传统性别观念的多元解读

男教师与女教师、女学生在近代新式女子学校一起学习,共同构筑着以生产和传播知识为中心的公共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传统礼教对公共空间之中的性别界限的束缚。由于在个人的家庭背景、生活阅历等方面存在差异,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师生们对于传统性别观念的解读具有明显的多元特征。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齐国梁既是官立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也具有留学日本的经验。1909年,他在北洋大学师范科完成学业后,便赴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留学;1911年冬,尚未毕业,就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返回日本完成学业,并入研究科继续深造;1916年,受聘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出任校长。^①

齐国梁对近代人权思想有过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因此,他否定了儒家视女性为附属物的性别观念,还从文本书写者的性别身份来分析历史上有关女性的论述,发现以愚、弱、卑来界定女性地位的传统论述往往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立论的。“其垄断人权,而唯我独尊宜也。孰意影响所至,即女子著作家其思想亦不能出其范围。郑氏之《女孝经》,班氏之《女诫》,其条目中虽不无可取,然其视女子为卑下,则千百年如出一辙也,不尤足怪乎?”^②

众所周知,《女孝经》和《女诫》皆为宣扬传统妇德的儒家经典。齐国梁借助对这些传统经典的批

① 齐国梁(1885-1968),直隶宁津人。1916年起,担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21年,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文学学士、教育硕士学位,之后又考入哥伦比亚研究院学习师范教育;1925年回国后,再次担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28年,代理河北省教育厅第一科科长;1929年,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成立,接任院长;抗日战争期间,任教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任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1949年以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参见齐文颖《毕生从事师范教育的齐国梁》,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近代天津十二大教育家》,第17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璧亭《女子教育》,载《直隶第一女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三期,1917-04。

判,传播了自己颇为现代的性别观念。在他看来:“泥旧者既视女学为多事,而趋新者又漠视女子之特性,而沾沾焉。拘牵于形式,昧于平等。张惶粉饰,弊窦丛生。”他认为,应该在承认男女教育并重的前提下,根据女性的特质举办新式教育。从其教育实践来看,他十分重视家政科的设立和发展。实际上,齐国梁的教育理念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女子教育思想的影响,也没有脱离注重女性家庭角色的中国传统性别观念。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所聘请的教师多具有新式教育的背景,但他们对传统经典所蕴含的性别观念的评价却充满差异。教师马千里^①透过性别视角阐释孔子学说,强调对于儒家思想应加强历史分析,尽量避免对传统经典的曲解和附会。他说“或曰孔子固大圣人也,然尊君之说,既不宜于今时女子,女子难养一言,几同小人,尤与男女平等主义不相合。不知孔子生君主时代,不得不尊君,观其一言一论,未尝不以爱民、富民、教民为心也。《诗》首《关雎》立教化之本,未尝不注重女学,以端家庭教育也。后世读圣人之书,不知圣人之意,附以三从三纲之说,变本加厉,以肆行其专制手段,愚民政策。”^②马千里的论说重点在于否定以专制手段蒙蔽民众思想的种种做法。

另外,在马千里看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不越乎法律之外,一切无不可以自由。故世运极乎真理,人人皆圣贤,人人皆豪杰。科学之进步,不待言矣。且也人各守法律,则官民之阶级可以永远破除。人各怀道德,则男女之畛域,不必过为限制……苟文明日进,人民之程度日高,即民选官吏、女子参政,亦奚不可哉。况乎有良家庭,而后有良社会。社会良,则国家由之而强盛。”^③

马千里的观点融合了西方自由平等观念和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从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主办者视自由之说为异端,到马千里就自由、平等畅所欲言,女子教育理念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转换以及社会文化的变迁。然而这种变化并不彻底,还有很多传统文化的留痕。

白眉初^④则不断强调女子教育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一国男子尽有贤妇,则消息未萌,避危无形……茫茫大陆,霍霍男儿,且尽抱敌愆从戎之气,而矢枕戈旦之忱,斯固非政府之命令,报纸之鼓吹,雄辩家之词锋所能及其万一也。”^⑤他把女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与其婚姻的选择联系起来,强调女性对国家的贡献是透过婚姻以及对身边男性的协助、鼓励

来实现的。这种将女子教育和婚姻家庭问题置于国族主义的论述之中,进而与社会公共事务发生密切联系的见解,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是也暴露出他的性别观念仍然没有完全脱离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窠臼。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男性教育者的性别观念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救国使命的驱使和新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投身新式女子教育,施展各自才能,塑造理想中的女性,进而实现成就自我、变革社会的理想。作为施教者,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因此获得了向女学生传递自身对传统文化态度乃至性别观念的机会。他们在借鉴欧美以及日本女子教育理念和学校制度的同时,也延续了晚清以来男性知识精英赋予女子教育以国族主义色彩的新传统,其中不乏传统性别文化与观念的遗存。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修身课虽然已经不再囿于重复传统的女教经典,转而侧重于晓之以理的讲授,并避免一味的灌输和训诫,但是仍然受到传统的某些影响。那些已经走出深闺、进入学校的女学生对于传统性别观念、文化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予以言说。

在女学生中,对中国传统性别文化批判者有之。学生王慧兰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代关于女教的经典,几乎没有提到所谓“平权学说”。实际上,在政治专制时代,不但男性与女性不平权,而且男性与男性也不平权。如今男女已经同处于共和时代,教育既能增进女子的学问,也可发展其才能。如果固守诞生于专制时代的三从四德之说,显然有悖于时代的发展。^⑥

① 马千里(1885-1930)天津人。1906年毕业于北洋大学俄文专科班,先后在广西龙州师范学堂任国文、算学、体操教习;1907年在上海私立振华学校,学习英文、数学和理化;1908年入天津私立敬业中学(南开中学前身)插入甲班学习,当年参加自治励学会,被选为会长;1912-1914年执教于南开中学;1915年起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务股主任、修身科教员、法制经济科主任及庶务课长。

② 金庆畴笔述《本校马千里先生之修身谈》,载《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二期,1916-12。

③ 金庆畴《马千里先生之修身谈》,载《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二期,1916-12。

④ 白眉初,名月恒,1913-1916年担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史地科主任、国文科教员、图书股主任及预科主任。

⑤ 白眉初《女学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载《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二期,1916-12。

⑥ 王慧兰《男权平权说》,载《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二期,1916-12。

还有一些女学生对中国传统性别观念、文化充满依恋。学生赵懋华一方面为女性获得自由感到十分欣慰,另一方面则流露出对于“德之不修”、“礼之不讲”等社会现象的焦虑。她指出“今之所谓自由者,循乎礼,则以为迂腐。恃其纵恣之心,无所不为,不适其中,且不能得矧逸乎其外者哉。是吾所以见女德之渐灭也。夫自由所以养人之活动性也,岂知不得其益而愈以自祸哉。故国家之文明,人论(疑为伦)之顺序,系之乎礼,万古不易者也。然则如之何而修之,曰重乎礼。”^①

赵懋华的担忧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社会性别关系的某些变动和调整对女学生们造成的冲击。在她看来,经典与传统所蕴含的哲理和智慧,似乎可以使国家度过危机,使社会恢复稳定。不容否认,这些言论也表达了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部分师生的思考和心声。

三、传统文化的整体思考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师生们对于传统妇德提出了一些质疑和批评,但都是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的思考。除了性别这一维度,他们还结合时局的变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命运进行了整体分析和评估。他们的观点一方面回应了部分社会思潮所提出的重大命题,另一方面也融合了自己的生命体验以及对现实的思考。

就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师而言,无论是否曾经出洋留学,其思想发展的脉络主要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在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时期,教授国文的邓毓怡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桐城派大师吴汝纶^②的得意弟子。1903年,为了探求新知,邓毓怡前往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留日期间,受激进思想影响,他曾与同学密谋暗杀慈禧太后,但遭失败。1904年,邓毓怡毕业回国,对暗杀行动的失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意识到要扭转时局,必须依靠民众的觉醒和参与,而兴办教育是开启民智的必由之路。于是他回到家乡直隶大城,在家人的协助下,创建了两所新式学堂,定名为启智学堂和自强女子学堂,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清末新政时期,直隶掀起兴办新式学堂热潮,邓毓怡因办学成绩显著,相继被聘为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和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教员。^③ 学生沈亦云后来在回忆录中生动描述了邓毓怡在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教学时的情景“邓先生是注意学术思想的人,引我们认识先秦

诸子,提示时代地域与思想文体的关系。他叫我们看一段文字,评论其为某类作品,这亦是一个速成教法。讲堂上读不了多少书,然如果好学,亦可藉以得点门径。”^④透过沈亦云穿越时空的追忆不难发现,邓毓怡虽然具有留学日本的教育背景,但是其学术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无法割断的。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聘请的教师马千里是新式教育的受益者,其生活经历呈现出中西杂糅、传统与现代并存等特征。因此,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值得关注。例如,在师生们讨论的话题中,如何保存国粹是一个热点。由于执意守旧者和一意维新者一样,都过于偏颇,难以完整地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对此,马千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知保存国粹不在株守一人之说,惟在修明诸子之学,析其流派,阐其义理,吸其精华,吐其糟粕,并参证西籍,取彼之长,以补我之短,铸新旧于一炉,聚东西诸先哲晤对于一室,淬砺之,力行之,庶几成为二十世纪之新学术。思想之纯粹,文化之进步,其皆基于此乎。”^⑤显然,他所提出的这些见解,考虑到了如何在变动中保存传统文化之精华,并不断为传统文化注入活力等深层次问题。

与马千里“铸新旧于一炉,聚东西诸先哲晤对于一室”的学术思想不同的是,有些师生更加推崇孔子的学说,并通过与西学的比较凸显其作为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例如,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授国文、史地等科的白眉初,不论是人生经历还是思想观念都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1909年,从北洋师范学堂毕业的时候,虽然科举制在数年前已经废除,但他还是得到了清廷给予的举人功名。他并不否认孔子学说与西方学术存在许多共通之处,却更强调孔子学说的经典价值“其所言之智仁勇者,与心理学之知情意,教育学之智育、德育、体育均相符

① 赵懋华《女德论》,载《直隶第一女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一期,1916-04。

②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1868年,入曾国藩幕府;1870年,又为李鸿章重用,担任过天津知府、冀州知府;1889年,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1902年,被清廷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③ 刘兰芳、王承惠编《大城县教育志》,第十三编,第2页,大城县教育志编委会1999年版。

④ 沈亦云《亦云回忆》,第42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

⑤ 金庆畴笔述《本校马千里先生之修身谈》,载《直隶第一女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二期,1916-12。

合。其所讲教育、伦理、政治、哲学之精粹论说,足令东西洋古今学者一齐俯首。”^①

然而,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女学生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她们不仅在朗读、背诵中体会经典的韵味,而且通过撰写作文,模仿经典作品的文体和文法,增强审美意识,为表达自己的思想、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一定的基础。同时,她们也会结合自己学习的经历和人生体验,深入思考,形成判断。于是,她们的思想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穿梭。例如,陶葆权在日记中就描述了自己在国文课上学习有关“淳于髡止齐伐魏”的内容时,所引发的思考以及观照、评论时局的心路历程:“譬齐魏久相持,恐为强秦大楚之所乘。读之对于当今时局不禁感慨:南军以护法为名争抗不让,北军视南军为乱党,穷兵黩武,相持已两年有余。恐亡国之惨,即在眉睫之间矣。日本假协约之名,派兵西比利亚,边患日亟,而当局者视如秦越,仍以自相残杀为能。噫!淳于髡之言,诚当今之药石也。”^②

有些女学生还采取辩论的形式来探求传统经典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例如,陈媛和郑寿禄便围绕经学的价值展开过深入的讨论。陈媛首先将中国比欧美开化早归功于古圣先贤创立的经学,以此反驳视经学为空谈的看法。然而,郑寿禄却提出相反的意见。她认为“经学虽优,终属一家之言,未足以尽括天下之学术也。虽足为个人进德之助,而于思想自由大有阻碍。”对于郑寿禄赞成维新派所提出的经学不切实用的观点,陈媛则予以辩驳。她指出:经学未必不能实用,只是国民缺乏深入的研究。“观其哲学、伦理、教育之粹语,政治实业之讲求,质之欧美学说,未尝不相符合。”^③在郑寿禄看来,并非只有经学注重伦理,欧美在物质进化的同时,道德精神也随之进步。^④通过辩论,无论她们自己还是其他学生,对于经典的内涵、价值以及中西文化的特质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一些偏好革新者,往往斥责中国传统文化无用,甚至弃如敝屣。对此,有的女学生从开民智的角度重新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如学生苏异尘所言“国粹者,所以表示国家精髓历代文化,以备后世之用者也。鉴古知今,惩前毖后,发扬国徽,开通民智,咸惟国粹是赖。故地无东西,国无大小,莫不有国粹,亦莫不保存国粹。斩决国粹,即斩决国脉也。”^⑤虽然她也承认中国国力衰弱是由于物质文明匮乏,应向欧美国家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但是绝不能因此将本国的国粹

一概抛弃。

对于近人轻视孔子学说和传统文化经典的现象,有的女学生十分不满。例如,凌瑞棠就曾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在假期中的阅读经验“膳后入书室,整理书案及书架毕,坐西窗下读《论语·学而时习之》一章,觉孔圣之言万世不渝,诚可谓圣之时者。惜近人以旧学目之,致吾辈不获多读孔圣书耳。”^⑥其遗憾之情溢于言表。有些师生在称赞孔子学说的同时,也并不讳言经典在传播过程中时常遇到被误读、误解的境况。为此,她们更加关注经典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身份和境遇,从更深层次学习和理解传统文化。

女学生们还不断赋予传统经典以现代意义,为直面社会现实问题提供某些答案。对于一些青年学子仅仅学习了西方自由之说的皮毛就放言高论的行为,一年级学生孙谷城、张淑文表示反对。她们以孔子学说对这些青年学子进行纠正,并重新界定何谓“自由”。在她们看来,烈夫、义士、贞女、节妇赴汤蹈火,一往无前,矢志不移,视死如归,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是尊重了个人良心的自由。只有做到“居仁由义,事事本之良心,言不徇私,行为果敢。一群之反对,一时之诽谤,非所计也”,才能得到人们的推崇和支持,从而获得最终的自由。假如任由个人的私欲膨胀,“己固不自恃,而人亦得挫折之”,那么最终一定没有丝毫的自由可言。无论道德之自由还是法律之自由,都不应违背孔子所言“从心所欲不逾矩”。^⑦

由此可见,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师生们是在中西互观的跨文化视野中解读经典、认识传统的。值得肯定的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了传统文化的近代阐释和传播。教师之间、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充满差异,内涵也颇为丰富。

另外,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则进一步加深了对于

① 刘峻渤、凌集嘉笔述《仲春上丁本校白眉初先生对于谒圣之讲演》,载《直隶第一女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一期,1916-04。

② 陶葆权《日记》,载《直隶第一女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五期,1918-12。

③⑤ 郑寿禄、陈媛《经学之舌战》,载《直隶第一女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一期,1916-04。

④⑥ 郑寿禄、陈媛《经学之舌战》,载《直隶第一女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二期,1916-12。

⑦ 孙谷城、张淑文《自由界说》,载《直隶第一女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三期,1917-04。

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教师还会特别设计、安排一些题目,让她们以文代答,使学生们深入思考社会现实中的某些问题。例如,教师请学生就心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否可行这一问题撰写作文“现今人心陷溺,风俗浇薄,以致政治不良,国事遂不堪设想。救之之术当以挽回人心为本,而欲为孟子之正人心,应倡阳明之讲心学。但处今之世,心学是否可行,于世会又为一大问题。诸弟学问经验素深,讲求其各抒胸臆,毋隐。”^①对此,学生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些学生认为心学虽然能挽回人心,但是救时弊的关键在于“去私欲,致良知”,因此讲求心学并不是目前最急切的。女学生们的观点尽管并不一致,但是通过这个讨论,有助于深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除了课堂学习、撰写作文,传统文化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还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传播。新文化运动时期,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仍举行传统的祭孔仪式。在神圣的空间与时间的交汇中,师生们共同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动态再现与展演,更使得经典通过仪式这种特殊形式得到进一步诠释和传播。同时,祭孔仪式也成为该校修身课的第二课堂。师生们在表达对古代圣贤的崇敬的同时,彰显了自身参与文化传承的主体身份。

此外,女学生们在课余还成立了包括文学社团在内的多个社团,如文社、诗社、心学社等。在这些社团中,学生们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进一步钻研传统经典的精义。创作诗词歌赋的文学实践,更使她们与传统经典的文化传承产生微妙的联系,并获得独特的体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社团的宗旨往往蕴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例如,文社的宗旨为“学习通俗杂体之文,雪书生无用之诟也”;在诗社,学生们通过诵读、创作诗词歌赋陶冶性灵;心学社则“讲演阳明学,杂以圣贤英雄传。所以正人心而挽颓风也。夫哀莫大于心死,国弱不足病,病人之无心耳。心学社以发达良心为目的,以日记为心学之试验场”。这些社团以女学生为主体,由教师加以辅导和点拨。通过参加社团活动,女学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也进一步增强了与教师的交流。其意义更在于,传统文化的诠释和传播不再是男性知识精英的特权,而是两性共同承担的责任。

四、结 语

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式女子学校以培养和塑造“国民之母”、“女国民”等为主要目标,在传授

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并没有完全终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依然如此,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就是其中之一。

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反传统的激进言行并存的历史图景是,国立新式女子学校为女性接触和学习传统文化提供了多种方式和可能。因此,对传统经典的阐释不再是男性知识精英的特权,而通过两性的共同解读和传播,具有更加丰富的性别意涵。师生之间的问答、学生之间的辩论都赋予传统经典的近代阐释和传播以一定的性别意义,其中也隐含着男女两性的对话和共同创造。女学生创作的传记、诗歌、小说、日记等作品,则从独特的视角诠释和传播了传统经典的某些意涵,使女性“立言”成为现实,并且更多地展现出女性的主体价值和现代风采。

与传统时代明显不同的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语境下,新式女子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对于经典的阐释往往与国族主义话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出于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愿望和对社会失序的极度焦虑,他们不断阐发传统经典的时代意义乃至普世价值,为自己面对的现实提供解答。教师与学生从语言文字的识读、思想内涵的解析及价值观念的探寻等方面,深入挖掘和彰显传统文化的精华,重视礼仪和道德。这充分表明他们努力从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和武器,但其中有些看法则稍显稚嫩。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报刊媒体既为传统文化在近代的阐释和传播中提供了十分便捷、开放的舆论平台,也使得传统文化的近代建构接纳了更加多元的声音。尽管用“众声喧哗”来形容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借助报刊媒体,女学生更加轻松、自由地表达思想,抒发情感。更为重要的是,报刊媒体使得女性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阐释突破了个人、家庭、私塾等狭小的空间限制,也不再局限于女性社团成员之间的交往,从而更突显其社会意义与现实价值,并且留在她们的历史记忆之中。这也为后人反思新文化运动时期历史记忆的形成与传播等重要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本。

【责任编辑:王建平;助理编辑:肖时花】

^①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四期,1917-12。

From Science Education to Scientific Education: Modern Natural Science Influences on Education (by YI Hong-jun)

Abstract: Natural science from the 16th century to the 17th century ha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all kinds of fields. This achievement had promoted the spread of modern 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The pioneers of science education gave natural science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ir teaching plans. Mean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 had given rise to a number of new schools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eaching contents and methods. 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natural science , educators began to explore the law of education so as to make it more scientific. In brief , the booming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science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education. It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tific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modern times; natural science; science education; scientific education.

Reflections on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 Study of Zhili Number 1 Girls' Normal School (by LI Jing-fang)

Abstract: The new public girls' schools encouraged female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multi way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Explan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lassics were conducted by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 which challenged authority of male elites on analysis of Classics from gender perspective. Under the national crisis in Modern China , nationalism had enormous influence on their views and discours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Zhili Number 1 Girls' Normal School intended to save the nation by emphasizing the permanent value and current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lassics. They also expressed their anxieties about disorder of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debates , poems , diaries and etc. The news media in Modern Chin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Free and open discussions abou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reflected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nation's future.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se discussions created their images and strengthened their subjectivities in public space.

Key words: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raditional culture; Zhili Number 1 Girls' Normal School; women's education; gender.

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Movement: The Rising of Simple-literacy Primary Schools (Xuesh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y CAI Yu-long)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considering the text applicability under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 the desire for preserv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enlightenment under the demands of nationalism , and the qualifications of "constitutionalism" voters ,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literati elite began to focus on the lower people's literacy issues. From 1908 , the Qing dynasty carried out a simple-literacy movement. The movement showed people'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deals from enactment of simple literacy to urging and assessing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provinces. Though the local governments showed certain rapid progression in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and there appeared some false phenomenon in reported results , the deep social background , positive operational measures , and the larger achievements all inspired the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nationalism; cultural movement; simple-literacy primary schools (Xueshu) ;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on Turnover Intentions (by MA Chao , XUE Dian-fang , MAO Chong-lin)

Abstract: Organizational justice describes the individuals' (or groups') perception of the fairness of treatment on system , policy and strategy which are related with personal interests and received from an organization. If an employee feels unfair , he will linger over his work , and he may even have the turnover intention and quit his job. The study in China's cultural background aims to construct organizational justice questionnaire by down-top strategy , discusses the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the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on turnover intentions. Firstly , the result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indicated that the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in China comprises three factors "procedural justice" , "distributive justice" , and "leader justice". Secondly , the results of linear regression indicated that the organization justice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turnover intentions and the strongest prediction of leader justice to organizational consequence variables compared to procedural justice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Thirdly , the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indicate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cts as partial mediator between leader justice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 while acts as total mediator between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Besides , job satisfaction acts as part mediator between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justice; multiple needs model; job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locus of control; turnover intentions.

Facet Analysis of the SES's Structure Validity by Facet Theory Approach (by YANG Jian-yuan , CHEN Wei , ZHAO Shou-ying)

Abstract: Facet Theory , a new research method about social science , integrates theory construction , research design , and data analysis in a systematic way. A mapping sentence for SES was constructed , taking into account of the technology of mapping sentence and the faceted definition of self-esteem in view of the sociology.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was tested by the practical investment. In this study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SES was empirically tested by facet theory approach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ES has ideal construct validity , every facet was clearly represented in the scalogram of SSA. The three facets played the axial roles and a two-dimensional SSA resulted in an acceptable coefficient of alienation of $k=0.128$. The study also presented a new exemplar to illustrate the utility of Facet Approach by questionnaire design and data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y research a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Facet theory.

Key words: SES; structure; facet analysis.